

“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命名与初步研究

侯亚梅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 本文以新的观察角度和定位方式,介绍了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东谷坨遗址石器工业研究中“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发现、初步研究和命名。文中略述了“东谷坨石核”和华北旧石器晚期楔形石核的密切关联,评价了“东谷坨石核”类型在华北旧石器早期文化研究中的意义,提出了对今后研究的启示,认为“东谷坨石核”有可能成为研究华北小石器文化发展脉络及探索细石器文化传统渊源的新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 早更新世;“东谷坨石核”;小石器;细石器

中图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 (2003) 04-0279-14

1 前 言

上世纪之初西方人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揭开了泥河湾盆地科考活动的序幕^[1],自 60 至 70 年代末我国学者发现虎头梁和小长梁等遗址以来,泥河湾盆地进入了不断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址特别是早期文化遗址的新阶段。从年代学基础、工作的持续性、出土遗物的文化内涵及为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度等方面看,小长梁和东谷坨是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遗址中较为突出的两个代表性遗址。围绕着两个遗址石器工业的文化面貌,特别是关于其原始性与进步性的问题,学术界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发表过各自的看法^[2-6]。本文将着重就东谷坨遗址石制品研究中“东谷坨石核”类型概念的提出、该分类的类型学基础及其制作程序给予较为详尽的阐述与解析,并对该类型于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早期文化中出现的意义提出作者的看法,供学术界进一步讨论。

2 东谷坨遗址发掘和研究背景

1981 年发现的东谷坨遗址是继小长梁遗址^[2]之后在泥河湾盆地发现的又一处早更新世旧石器地点。迄今为止东谷坨遗址的发掘工作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 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初步发现与发掘;2) 上世纪 90 年代起与国际接轨后较为规范和细致的发掘。有关石制品材料的研究工作也依时间细分为以下阶段(详见表 1)。

1) 80 年代初的发掘与相关研究^[3-4,7];

收稿日期: 2003-07-07; 定稿日期: 2003-09-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172009);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0218511)

作者简介: 侯亚梅(1965 -),女,陕西省三原县人,1987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旧石器考古学研究。

- 2) 90 年代初中美合作发掘与研究;
- 3) 90 年代末的发掘和对同期出土材料的研究^[8-40];
- 4) 本世纪初对东谷坨遗址的最新发掘和对上世纪 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末出土材料的重新研究^[11]。

表 1 东谷坨遗址工作的 4 个阶段

Four periods work at Donggutuo site

工作阶段 具体内容	1	2	3	4
发掘年份	1981, 1983	1991, 1992	1997	2000 —
发掘范围	T1—T5	T1, T4	T1	T1, T4
发掘层位	A—E	A, B, C	A, B	A—E
发掘者	卫奇等	中美合作, 由卫奇与 Clark 带队 *	卫奇与本文作者等	卫奇等
研究成果	卫奇, 1985 Schick 等, 1991 侯亚梅, 2000 侯亚梅, 2003	——	侯亚梅, 1998 侯亚梅, 1999 侯亚梅等, 1999 侯亚梅, 2000 本 文	进行中

* 本文作者参与发掘和野外整理工作; —— 未发表

自从泥河湾盆地发现旧石器遗址以来, 有关遗址的年代就存在一定的争议。比如小长梁遗址, 最初的研究者从遗址的地层剖面和共生动物群种类两方面的对比认为该遗址属于早更新世, 更有古地磁研究推测该遗址的年代为 150—300 万年, 这引来了学者们对于其石制品所显示出的“先进性”与年代之古老难以符合的疑问^[2]。原研究者后来曾将其年龄调整为 100 万或大于 100 万年^[12], 而小长梁遗址的最新测年为 2001 年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的古地磁数据 136 万年^[13]。东谷坨遗址距小长梁不足 1 km, 从发现之初, 其地貌和生物地层两方面的证据都表明它与小长梁遗址的时代相当, 中外专家的古地磁研究均为大约 100 万年左右^[7, 14]。目前由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开展的新一轮古地磁工作可能会将这一年龄向前延伸, 但是依然晚于小长梁遗址的时代(王红强, 个人交流)。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参与中美合作发掘东谷坨遗址之后, 引起本人直接研究东谷坨石制品的机缘是 1997 年由卫奇组织的一次小规模发掘。中美合作发掘使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在野外工作方法上与国际正式接轨。1997 年的发掘在 1991—92 中美合作发掘的基础上, 扩大了原合作发掘探方的面积, 发掘层位限于文化层中偏上的 A、B 两层, 出土了较多以往并不常见的类型, 如: 锯齿刃器、雕刻器、端刮器和凹缺器等, 在对 1997 年出土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中, 本文作者等首次提出了“东谷坨定型石核”的概念^[9-40], 并将其作为独立的分类类型与遗址中的其它石核类型相区分予以专门研究, 应该说当时的研究比较粗浅, 对这一新的石核类型的认识十分有限。由于决定将博士论文题目改为“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石器工业^[11]”, 本文作者得以有机会对东谷坨遗址 80 年代初发掘的出自所有地层的石制品重新研究。在博士论文中作者正式提出用“东谷坨石核”的概念取代先前“东谷坨定型石核”的临时定名, 本文便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相关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

3 “东谷坨石核”名称的前身——原“东谷坨定型石核”的背景

原“东谷坨定型石核”是在 1997 年的发掘中被首次发现和定名的^[9-10],这是一类有规范形制和固定的打片程序的石核,反映出了石器制作者明确的制作想法和生产目的。在研究 1997 年的材料时有 10 件被定名为“东谷坨定型石核”,占当年出土石核材料的 9.3 %。由于这个发现,在重新研究东谷坨遗址过去的材料时便特别注意是否有类似的石核存在。果然,发现了 34 件具有相同制作程序的石核,它们共占石核总数的 34.6 % (图 1)。当有机会把它们和多于它们 3 倍的同类石核放在一起进一步详细研究后,感到当时的认识仍很初步,对它们的把握也还不够全面。当时命名这批石核时曾指出只是“暂时定名”,这为进一步研究后可能产生更为合适的命名留出余地。最初研究 10 件“东谷坨定型石核”时,未能产生一套较为明确的定性标准,所以,在研究 34 件定型石核时,将它们也纳入重新研究的范围,以期认识能更为客观、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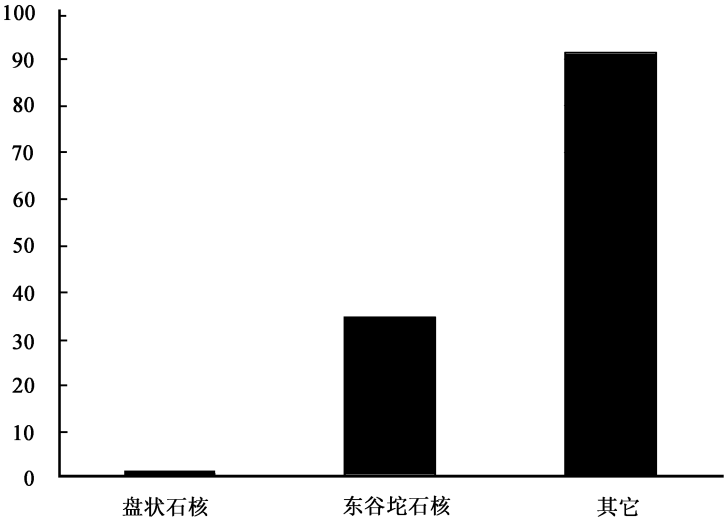


图 1 东谷坨遗址各类石核比例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core types of Donggutuo site

4 “东谷坨石核”的观察、命名与研究

4.1 “东谷坨石核”的定位与观察

根据原定名为“东谷坨定型石核”即后来被重新命名为“东谷坨石核”的一批石核的稳定形态和重复出现的一致特征,为便于总结规律,除对它们进行了与其它石核共同的项目观察之外,针对它们的共同特点拟定了新的定位体系(图 2、3)和补充观察项目。

- 台面 C: 0. 自然 1. 人工
- 修整位置: a(端), b(端), Aamb(段), Bamb(段),
w(修疤布满台面边缘的情况)

横 A: 0. 自然 1. 人工 p. 平面 g. 凸面

横 B: 0. 自然 1. 人工 p. 平面 g. 凸面

剥片位置: a(端), b(端), Aamb(段), Bamb(段),

w(剥片行为发生于台面的周边的情况)

z(纵向剥片)台面角:

h(横向剥片)台面角:

片疤形态与片疤数: 长型 1、2、3 个等: c1、2、3x ...; 短型 1、2、3 个等: d1、2、3x ... (后缀 x 时表示具有片疤长大于宽的两倍甚至更多, 即细长石片疤的情形)

龙骨性质(龙骨指图 2 和图 3 中标为 a 点与 b 点通过 d 点的整个弧形连线):

0. 未修整(包括自然) 1. 修整

修整位置: Aadb 段, Badb 段 修整方式: 1. 单面, 2. 两面

\. 不见 inf. 不确定

有否在龙骨部位剥片: 0. 否 1. 有 inf. 不确定

底部崩疤痕迹: 0. 无 1. 有 inf. 不确定

底部细微磨损: 0. 无 1. 有, 轻度 2. 有, 重度

石核类型(依石核的纵剖面形状): 1. D 型 2. V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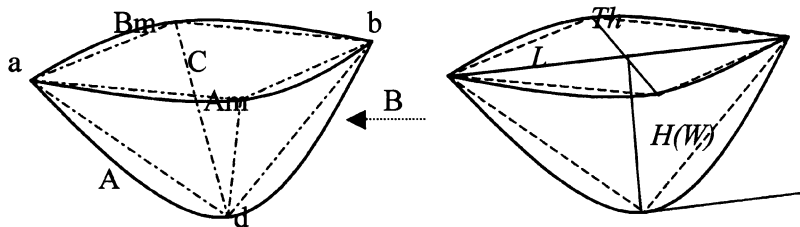


图 2 “东谷坨石核”的定位与测量

Pos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Donggutuo C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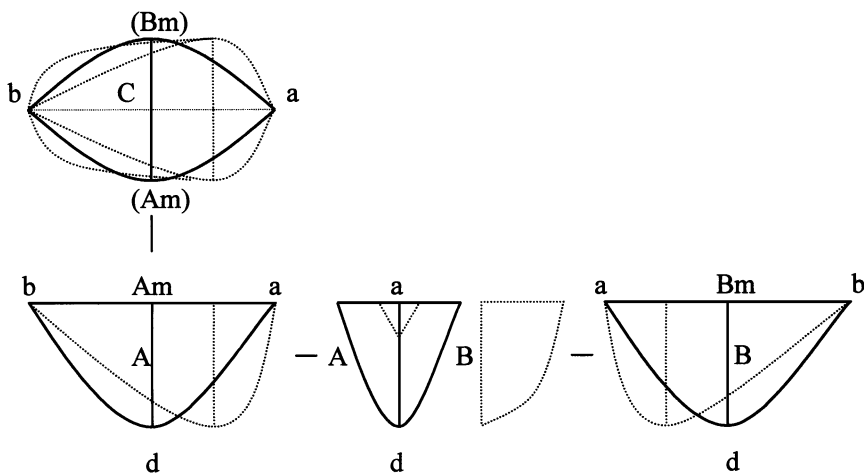


图 3 “东谷坨石核”解析图

Sectioned scheme of the “Donggutuo Core”

工艺流程阶段:

- 成坯
- 稍作尝试(包括开片,留下 1—2 个一般不成功的剥片疤)
- 剥片进行当中(3 个以上剥片疤,已开始获得适用的石片)
- 经充分尝试后废止

4.2 “东谷坨石核”的命名与研究

新的定位系统和观察项目是对原“东谷坨定型石核”类型的归纳与总结,说明了它们自身的诸多共性及其与遗址内其它石核的差别,表达了整体特点的确定性,与最初的认识比较,反映了作者对研究对象所经过的一个认识过程,由模糊、笼统而变得更为肯定和清晰,概念上也较前简洁。另外补充了对龙骨一段的定位与观察,再者明确了石核的分型和工艺流程阶段,这些都是原来所没有考虑到的。目前的观察较先前更为系统,也更便于表述。基于新的定位系统的研究结果显示出的有关证据清楚地反映了这类石核的特殊性以及它们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楔形石核的关系,经再三斟酌,依据命名的必要性、简洁性原则和国际同行惯例,正式建议以“东谷坨石核”(英文译作“Donggutuo Core”,可简称为“DGT Core”,中文亦可称作或写作“DGT 石核”)取代初次发表这批材料时使用的“东谷坨定型石核(DGT-shaped Core)”一名。

在 44 件“东谷坨石核”标本中标明来自 T4 方的 4 件,T2 方的 3 件,其余大部分应来自 T1 方,1997 年出土的 10 件则全部出自 T1 方。为尽可能完整地了解这批石核的面貌,重新研究时将它们放在一起考虑。基于各个项目的观察和统计,对“东谷坨石核”的研究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归纳:

原料 在东谷坨遗址石制品的原料中燧石占绝大多数,为 73%。根据实际情况,研究时将燧石分为优(颜色纯一、手感细滑、颗粒均匀,质材完整合一)、良(颜色较纯、质地中细、颗粒较为均匀,质材比较完整)、中(颜色不纯、质地相对粗糙、偶有节理发育、质材相对完整)、差(颜色参差不齐、节理十分发育、质材合一性差)四等。具体到“东谷坨石核”,其中 59%的质材为高品燧石(26 件);其次为中品燧石(12 件,27.3%);再次为低品燧石(4 件,9.1%);优品燧石和石英各为 1 件(各占 2.3%)。

毛坯 56.8%(25 件)的“东谷坨石核”由块状毛坯制成;15.9%(7 件)为片状毛坯;以砾石、石片为毛坯以及不明状态的毛坯各 9.1%(各 4 件)。

台面特点 台面完全为自然台面,未做任何修整的只有 2 件;在自然台面的基础上,在台面周边部分稍作修整的有 6 件;其余 36 件则全部为修理台面。1 件标本的台面呈凹状,1 件作鼓凸状,其余为相对平展状。台面周边都进行过修整的标本有 5 件;在台面的两端兼一侧缘修整的 7 件;只在两端修整的 3 件;一端两侧缘修整的 3 件;一端一缘的 5 件;在两侧缘和一侧缘修整的各有 4 件。所以,在端部进行修整过的标本共有 34 件,占“东谷坨石核”的 77.3%;只在侧缘进行过修整的为 8 件,占 18.2%;未做任何修整的 2 件,占 4.5%。可见,定位于端部的修整倾向十分明显。

侧面特点 横侧面 A 和 B(简称横 A 和横 B)的形态一般为平的或鼓凸的,由自然状态或人工修整而成。横 A 中的 28 例是鼓凸的,1 件是自然的,27 件是人工的;16 例是平的,2 件为自然,14 件为人工形成。横 B 中的 23 例是鼓凸的,3 件是自然的,20 件是人工的;21 例是平的,5 件为自然,16 件为人工形成。无论横 A、横 B 是一平一鼓还是二平、二鼓的组合,

都是向下收缩为纵切面为 D 或 V 的形状。

剥片情况 纵向剥片的统计情况如下:在两端(包括同时在侧缘)剥片的件数为 9 件;在一端(包括同时在侧缘)剥片的件数为 23 件;仅在侧缘剥片的件数为 11 件;没有剥片的有 1 件。这样,两端剥片的情况占 20.4%,一端剥片占 52.3%,端部剥片合起来共有 72.7%,侧缘剥片则为 25%。纵向(如果将石核的台面看作一个平面,则为大体上垂直于这个方向)的和横向(如果将石核的台面看作一个平面,则为大体上平行于这个方向)的剥片范围在横 A 和横 B 面积上所占的百分比情况如表 2 所示。纵向剥片的片疤叠压关系(层数)和横向剥片的片疤叠压关系(层数)如表 3。

表 2 “东谷坨石核”纵向的和横向的剥片范围百分比
Range of lognitudinal and transversal flaking of the “Donggutuo Core”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件数	6	4	8	5	5	9	1	0	3	3

表 3 “东谷坨石核”剥片疤层数与纵向和横向剥片的片疤数量

Layers of flaking and numbers of lognitudinal and transversal flaking scar of the “Donggutuo Core”

片疤层数	1	2	3	4	无
纵向	19	16	5	2	2
横向	23	10	6	0	5

“东谷坨石核”上显示出的片疤情况是了解剥片效果的有效途径,把所有长大于宽的石片归为长型石片,其它归作短型石片来统计后可知,沿台面的边缘进行纵向剥片得到兼有长型石片和短型石片的标本为 28 件,纵向剥片只产生长型石片的标本为 7 件,只产生了短型石片的标本 7 件,余下 2 件没有剥片。而横向剥片得到兼有长型石片和短型石片的标本只有 3 件,仅有长型石片的标本为 1 件,全部为短型石片疤的标本 35 件,余下 5 件没有剥片行为。纵向剥片共产生长型石片疤 89 个,短型石片疤 135 个;横向剥片共产生长型石片疤 6 个,短型石片疤 143 个。对每件标本上长型片疤和短型片疤的最大疤长的统计数值表明,两者分别在 11—44 mm 和 2.7—36 mm 之间。在 89 个纵向长型片疤中,长大于或极为接近宽的两倍者为 57 个(图 4),占长型疤的 64%,它们的片疤长在 10.7—39 mm 之间,宽在 3.5—17.7 mm 之间。而横向剥片所产生的屈指可数的 6 个长型片疤里,长度区间处于 23—38.1 mm,宽处于 >6—27.6 mm 之间,仅一个 38.1 mm 和 >6(因该疤被后来的片疤所覆盖,其宽度已不完整)的长宽组合,从疤的延展方向推断,它的长度已达到宽度的两倍。可见,纵向剥片生产长型片疤的效率大大高于横向剥片,对同一石核不同位置的剥片行为在“东谷坨石核”上表现出了结果的差异,而纵向剥片行为的集中更可能是操作者真实工作目标的反映,横向的剥片却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辅佐行为,而非最终目的,操作者具有明确的工作目的。

对 35 件经纵向剥片生产出长型疤的台面的台面角(41 个值,个别标本在一个台面的不同位置取两个数值)进行统计得出表 4。台面角介于 75—85°的为 27 例。对横向剥片的剥片角度的统计如表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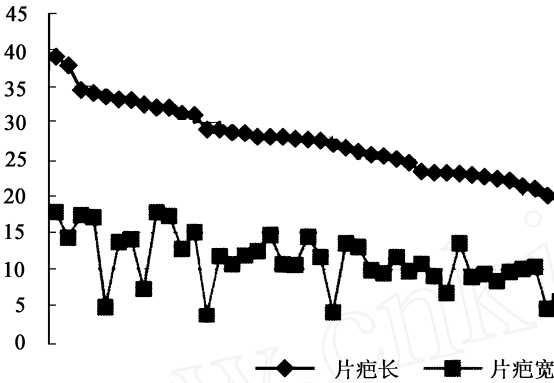


图 4 “DGT 石核”细长型石片疤长宽数值比较

Length and width of elongated flakes observed by negative scars on the “Donggutuo Core”

表 4 “东谷坨石核”纵向长型片疤的台面角(°)与例数

Striking angle and cases of lognitudinal flaking scar of the “Donggutuo Core”

台面角	60—69	75—78	80	81	82	83—84	85	87	88—91
例数	6	6	7	3	4	3	4	4	4

表 5 “东谷坨石核”横向剥片的台面角(°)与例数

Striking angle and cases of transversal flaking of the “Donggutuo Core”

台面角	45—68	70—74	75—76	80—81	85	89—90	> 90
例数	19	7 *	3 *	3	5	2	1

* 表示其中有一件或两件产生过长型石片

龙骨特点 龙骨的必要形态是构成“东谷坨石核”外形特征的重要部分,在台面两端以及向下的收缩都是为了获得适合的形态以便在打片时起某种控制功能。在“东谷坨石核”中,完全没有修整就已经具有龙骨的标本有 5 件,整个龙骨两面经过修整的 12 件;在龙骨的 ad 或 bd 段择其一进行两面修整的有 5 件;全部龙骨只经单面修整的 4 件;在龙骨的 ad 或 bd 部位择一进行单面修整的有 14 件;在龙骨的 ad 部分两面修整,而在 bd 部分单面修整的有 1 件;没有龙骨的 2 件;状况不明的 1 件。两面修整和单面修整的情况相差无几,使用哪种方式取决于具体的需要。

龙骨的实用功能是它的棱嵴部位在剥片时可被发挥的控制作用。观察表明剥片从某一段龙骨上部开始的情况比较常见,因为龙骨向下延伸构成突起的长嵴,使第一次剥片时的方向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也为后来的剥片创造了条件,东谷坨遗址出土的石片里确有部分带嵴石片。在 42 件拥有龙骨的标本里,23 件或多或少地利用了龙骨的有利条件,从龙骨开始剥片,其利用率至少达到 54.8 % 以上;由于剥片已进入相当程度,龙骨最初是否被利用的状况已不好判断的有 9 件;另有 10 件仍能看出尚未被利用。

很多标本龙骨的 ad 段靠近 a 端的部分和 bd 段靠近 b 端的部分常常发现并非打片造成的磨损痕迹,有细微的破损疤,可明确作此判断的标本件数为 23 件;5 件没有此类磨损;14 件不能明确判断。龙骨底部 d 部位发现出现频率很高的非正常打片造成的破损崩疤以及更

细微的磨损痕迹,统计例数分别达到 32 件(72.7%)和 37 件(84.1%),如果加上各自情况中难以确定的 5 件和 6 件,其出现率还要高得多。

分型 根据“东谷坨石核”的台面、横侧面和纵剖面的 V 状或 D 状的组合得出“东谷坨石核”的几个类型,也可以仅仅依据纵剖面的形状将它们概括为 V、D 两型(表 6)。V 型多于 D 型的一半以上。由表 7 可知“东谷坨石核”标本所处的工艺流程阶段以 I 和 II 阶段者居多数,超过一半。图 5 向我们传达了 V 型较 D 型在剥片上具有更大优势的趋向。

表 6 “东谷坨石核”的类型
Patterns of the “Donggutuo core”

分类型	总类型	件数		%
2VDV	V	5	30	68.2
2VVV		3		
DDV		18		
DVV		4		
DDD	D	8	12	27.3
DVD		4		

表 7 “东谷坨石核”各工艺流程阶段的标本数量
Numbers of the “Donggutuo Core” divided by stages of “chaîne opératoire”

流程阶段	件数	%
I	9	20.5
II	15	34
III	16	36.4
IV	4	9.1
总数	44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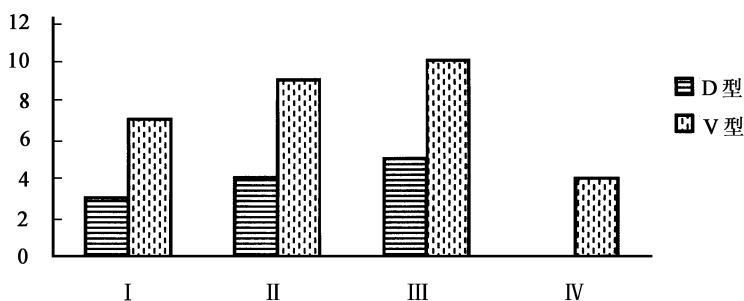


图 5 “DGT 石核”形制与工艺流程
Patterns and stages of the “Donggutuo Core” by “chaîne opératoire”

“东谷坨石核”工艺流程的复原 借助以上的观察分析可以尝试复原“东谷坨石核”的一整套生产程序:

第 1 步,从原料产地直接采集合适的砾石或从遗址附近的岩层露头部分采集石料^[23],

从中挑选形态和尺寸合适的原料,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石料上具有的平展的节理面常常成为遴选毛坯中的有利条件而被优先考虑。有证据表明石器制造者已充分注意到节理面的平展优势,而在后面的步骤中直接利用现成的节理面作为设计方案里对形态有特定要求的石核的台面或横(A、B)剖面之一。当原料上有两个具备适当接合角度的节理面时,更是兼用两者使之分别成为需要中的台面和横侧面之一。在正式剥片前,台面和龙骨的准备是两项最重要的工作,常常需要再做刻意的加工,与横剖面 A(主要的剥片面)相接的 CAamb 段(此处 C 代表台面, Aamb 是台面上靠近横剖面一侧的边缘地带,详见前面术语解释)或是 Ca 端(主要的剥片端)常见小的修理疤。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没有现成的龙骨(比如使用石片作毛坯时),便可被利用,对龙骨的加工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虽然也有极少数不做龙骨加工就进行剥片的例子。此为工艺流程的第 I 阶段,即“打造成坯”阶段(图 6)。处于这一流程位置的标本有 10 件,占这类石核总数的 20.5 %。

第 2 步,第一步获得的龙骨形态为第二步剥片作好了的必要准备。观察和统计数字表明,拥有龙骨并被当作首要的剥片部位的石核数量已超过一半,这还未包括那些因剥片已行至后段(如 、 阶段),龙骨部分随剥片的顺利进展而可能完全消失的标本。所以,操作程序中第一步与第二步关系十分密切,尽管也不乏失手,而不得不到此为止的例子。我们看到龙骨上端被打掉,露出倒三角的截面,它与台面的角度破坏了由此处开展下一步剥片的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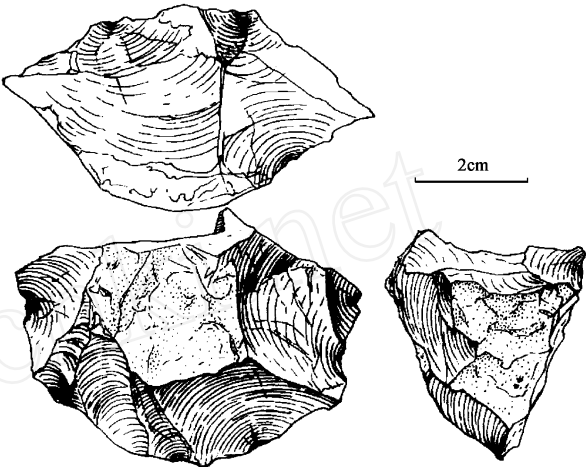


图 6 “DGT 石核”标本 97DGI770, 剥片流程第 I 阶段
Specimen 97DGI770 of the “Donggutuo Core ” at stage
I of the “chaîne op éatoir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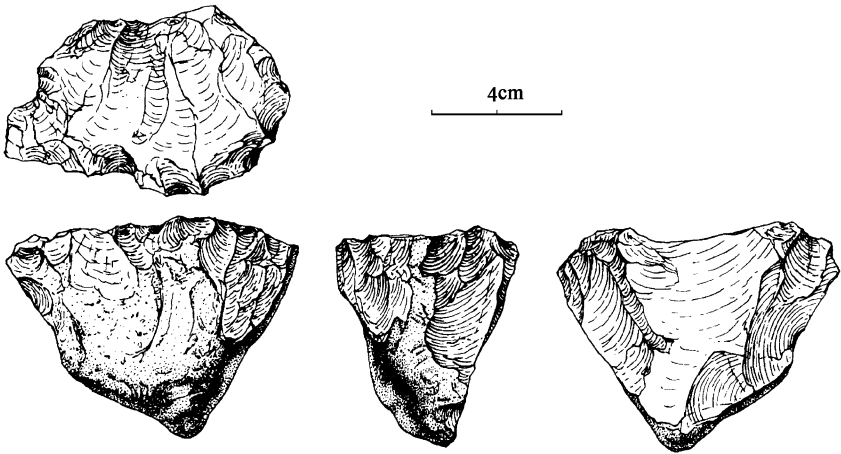


图 7 “DGT 石核”标本 97DGI576, 剥片流程第 II 阶段
Specimen 97DGI576 of the “Donggutuo Core ” at stage II of the “chaîne op éatoire ”

能。或许可以想象,44件石核应该是共同生活群体的不同个体制作的产品,有较为熟练的“工匠”,也有刚刚学徒的“练习者”,失误在所难免,一些石核就这样“先期流产”,而不再被赋予进一步的使命。处于这一阶段的标本里,不止龙骨部分留下剥片的“印记”,有时横剖面和侧端部位也偶尔产生一两个不成功(比如又短又小,或发生阻断)的剥片疤,对于这类剥片疤的性质不好确认它们究竟是辅佐于造坯,还是剥片,恐怕属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处于这一流程位置的标本有14件,占这类石核总数的31.8%。此为工艺流程的第 阶段,可谓“浅尝辄止”阶段(图7,图版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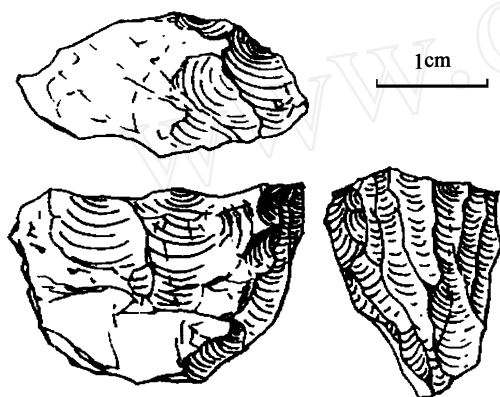


图8 “DGI石核”标本 97DGI809,
剥片流程第 阶段
Specimen 97DGI809 of the “Donggutuo Core”
at stage of the “chaîne op éato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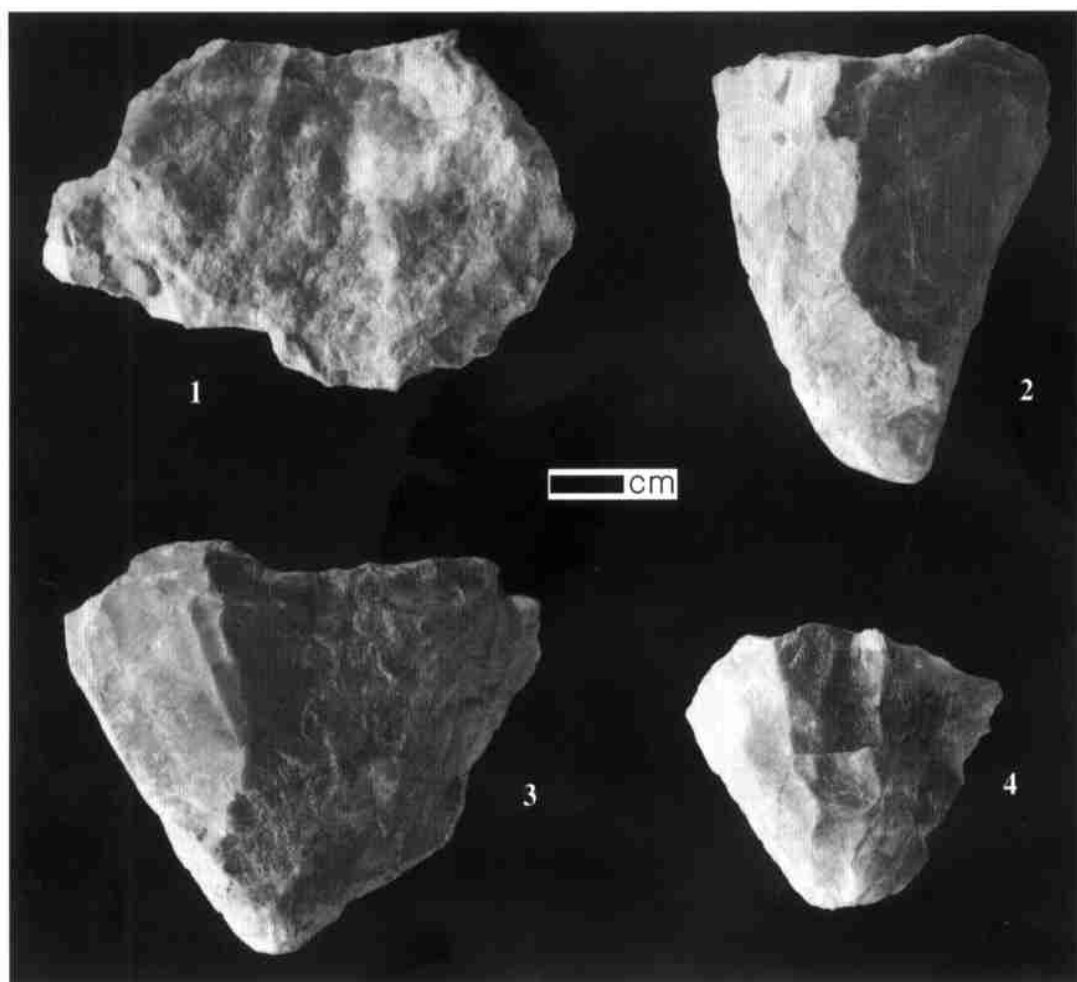
第3步,如在第二步获得成功,即进入本阶段的工作。有相当数量的石核成功地过渡到这一阶段,如龙骨已被利用,就只有龙骨的底部尚可被看到,而如果剥片进展深入,原有龙骨部位全部消失的情况也不乏其例。标本观察显示,这一步骤的标本绝大多数在台面的a端剥片,兼在aAmb段剥片的也不在少数,个别在a、b两端都予以剥片,甚至也有周身剥片的情况。这时,剥片进行得比较充分,获得长型片疤的机会也明显增多,可看到多层剥片疤的情况。处于这一流程位置的标本有16件,占这类石核总数的36.4%,与另外三个阶段相比,这个流程的标本最多,比例最高。此为工艺流程的第 阶段,可谓“酣畅发挥”阶段(图8)。

第4步,此时主要选择一端或两端剥片,也有个别在横剖面A剥片成功的例子。无论是哪种情况,石核上的片疤显示剥片工作已发挥到极至,到了实在难以进展下去的地步而废止。处于这一流程位置的标本有4件,占总数的9.1%。可谓“淋漓尽致”阶段(图9,图版 I,4)。

5 “东谷坨石核”与楔形石核

对“东谷坨石核”的观察的确使人联想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楔形石核,这一点曾为这批材料的最初研究者卫奇先生注意到,他在描述一件生产小长石片的石核标本时说:“其外貌与细石器传统中的楔状石核略有相似之处”。在文章的小结中他写道:“石器的基本特征是小型而加工精细,且具有细石器传统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的某些风貌”^[4]。本文对“东谷坨石核”的命名与初步研究,为上述初步看法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性诠释,也为厘定东谷坨石器工业倾向于细石器工业传统的性质找到了更为直接的标志性器物类型。

本文的研究表明“东谷坨石核”已经具备了晚期楔形石核^[15-22]的(图10)各个关键的类型学特征,“东谷坨石核”的定位、观察项目,同样适用于描述后者最基本特征。虽然“东谷坨石核”并未充分表现出传统概念中楔形石核的所有特点,后者的细致特点也不为“东谷坨石核”所一一具足,但是,两者在楔形石核体的设计和以此为基础的剥片方式等方面极为相似,设计思想几乎同出一辙,这一认识得到法国石器技术分析专家 Eric Boëda 教授的认同



(个人交流)。“东谷坨石核”与晚期楔形石核间的趋同与差异决定了她们之间的关联性和独立性,正是这种关联和独立使她们各自成为时空框架当中文化发展序列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个十分紧要的文化概念。事实上,在盖培先生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处于本文命名的“东谷坨石核”和众所周知的晚期楔形石核之间的某些环节,他列举了来自周口店和萨拉乌苏遗址的个别标本^[23]。有关两者之间概念的比较和她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讨论,限于本文篇幅,拟撰另文专门阐述。

6 结 语

“东谷坨石核”类型的确立是耐人寻味的,她是泥河湾盆地早期石器工业研究的一次新的重要发现,这一发现将为我国华北小石器工业研究带来新的活力。本文对于“东谷坨石核”的初步研究可能有点启示:

1. “东谷坨石核”研究在观察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立专门的测量项目,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次新的尝试,它丰富了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内涵,提供了新的研究个案。
2. “东谷坨石核”揭示出在东谷坨石器工业中除了已知的普通石核、石核制品,普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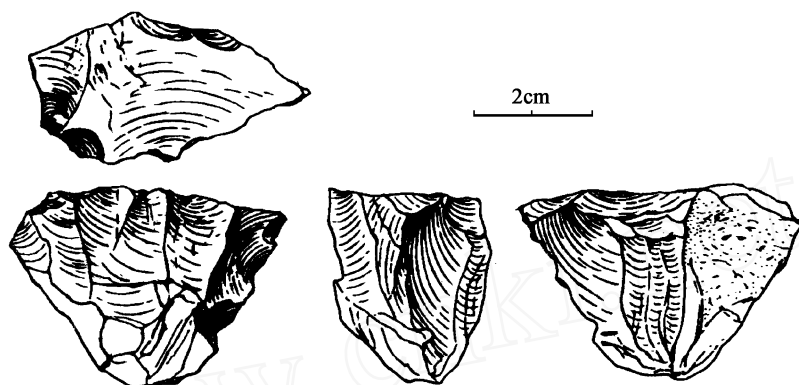


图9 “DGT 石核”标本 97DGI590a, 剥片流程第 阶段

Specimen 97DGI590a of the “Donggutuo Core” at stage of the “chaîne opérato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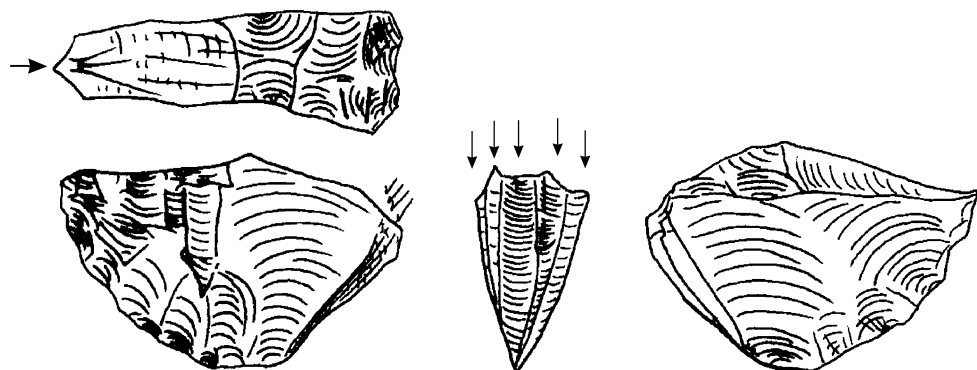


图10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虎头梁遗址的楔形石核

One case of microlithic wedge-shaped core from Hutouliang site of Upper Paleolithic in the Nihewan basin

石片和石片制品之外存在的另一个以生产细小长石片为目的的作业体系,这很可能反映了早期人类依某种环境因素变化而产生的多样性需求。

3. “东谷坨石核”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类型,她与晚期楔形石核的关联性预示着它有可能成为研究我国华北小石器文化发展脉络及探索细石器文化传统渊源的新的关键性线索。

4. “东谷坨石核”有可能是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阶段孕育出的特殊类型,在学术研究上,可能具有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器物类型“勒瓦娄哇石核”类似的标志意义。

5. “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发现与研究为华北旧石器早期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进而有可能对东亚早期人类技术发展水平的认识产生新的学术影响。

综上所述,“东谷坨石核”可以初步定义为:发现于华北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东谷坨旧石器遗址的预制石核,以生产细小长型石片为目的,形制为楔形。其整体形态的选择与设计、台面与侧面的修整技术和开始着眼于端部的剥片技术以及固定的打片程序,都明显表现出它与东亚、北亚和北美旧石器时代晚期楔形细石核的某种渊源关系,是研究华北小石器文化脉络的发展及探索细石器传统渊源的新的关键性线索。

需要说明的是,“东谷坨石核”是一个动态的技术类型学概念,在总的框架下,它包含完成这一概念所需要的若干(本文分为4个)不同工艺流程阶段的渐次状态。

本文只是对“东谷坨石核”的初步研究,随着今后工作的深入,“东谷坨石核”还会有更多的内涵得到发掘,她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们对华北早期人类文化的认识。

致谢: 本文是作者博士论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博士论文于2003年获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首先特别感谢卫奇先生对作者研究东谷坨石制品的大力支持,慨允作者使用他过往研究的材料;并衷心感谢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吴汝康院士和黄慰文研究员为笔者博士论文的完成提供的道义和学术两方面的大力支持与悉心指教;感谢盖培先生与笔者的讨论和所给予他的研究经验和体会的分享;感谢美国 Richard Potts 博士在作者与他讨论“东谷坨石核”命名问题时所给予的宝贵建议。感谢李荣山先生绘制插图,克服了很多由于原料质地复杂而带来的观察上的难度,经与作者多次认真的耐心交流,准确地把握了研究者观察到的细部现象而表达了这些石核的主要特征。

参考文献:

- [1] Barbour GB, Licent E, Teilbard de Chardin P. Geological study of the deposits of the San Kan Ho Basin[J]. Bull Geol Soc China, 1926, 5: 263—278.
- [2] 尤玉柱, 汤英俊, 李毅. 泥河湾旧石器的发现[J]. 中国第四纪研究, 1980, 5(1): 1—11.
- [3] 卫奇, 孟浩, 成胜泉. 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J]. 人类学学报, 1985, 4(3): 223—232.
- [4] 卫奇. 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J]. 人类学学报, 1985, 4(4): 289—300.
- [5] 黄慰文. 小长梁石器再观察[J]. 人类学学报, 1985, 4(4): 301—307.
- [6] 陈淳, 沈辰, 陈万勇, 等. 小长梁石工业研究[J]. 人类学学报, 2002, 21(1): 23—40.
- [7] Schick KD, Toth N, Wei Q *et al.*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Nihewan Basin, China [J]. J Hum Evol, 1991, 21: 13—26.
- [8] Hsu Yamei. New observations on Paleolithic of China reflected by three sites[A]. In: Budja M ed. Proclilo o Raziskovanju Paleolitika, Neolitika Ineneolitika v Sloveniji, XXV Ljubljana: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1998, 1—15.
- [9] 侯亚梅. 在泥河湾盆地可望找到二百万年前的人类遗址[J]. 第四纪研究, 1999, (1): 95.
- [10] 侯亚梅, 卫奇, 冯兴无, 等. 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再发掘[J]. 第四纪研究, 1999(2): 139—147.
- [11] 侯亚梅. 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石器工业[M].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00.
- [12] 尤玉柱. 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J]. 史前研究, 1983(1): 46—50.
- [13] Zhu RX, Hoffman KA, Potts R *et al.* Earliest presence of humans in Northeast Asia[J]. Nature, 2001, 413: 413—417.
- [14] Li Huamei, Wang Junda. Magnetostratigraphic study of several typical geologic sections in North China[A]. In: Liu TS ed. Quaternary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China,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1982: 33—38.
- [15] 王健, 王向前, 陈哲英. 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J]. 考古学报, 1978, (3): 259—288.
- [16] 王向前, 丁建平, 陶富海. 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3, 2(2): 162—171.
- [17] 安志敏. 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J]. 考古学报, (3): 289—316.
- [18] 张森水.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J]. 人类学学报, 1990, 9(4): 322—333.
- [19] 盖培. 阳原石核的动态类型学研究及其工艺思想研究[J]. 人类学学报, 1984, 3(3): 244—252.
- [20] 谢飞, 李. 籍箕滩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址[J]. 文物春秋, 1993, (2): 1—22, 70.
- [21] 鹤丸俊明. 北海道地方の细石刃文化[M]. 骏台史学, 47号. 1979, 23—50.
- [22] Derev'anko AP, Shimkin DB, Pwors WR.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 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A]. In: Laricheva IP ed. Transl.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 [23] 裴树文, 侯亚梅. 东谷坨遗址石制品原料利用浅析[J]. 人类学学报, 2001, 20(4): 271—281.
- [24] Gai Pei. Microblade Tradition around the Northern Pacific Rim: a Chinese Perspective[A]. 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21—31.

NAMING AND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ATEGORY OF THE“ DONGGUTUO CORE ”

HOU Ya-me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This paper is extracted from the author's PhD dissertation on the lithic industry of the Donggutuo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 of North China, which is a fluvio-lacustrine deposit of the Lower Pleistocene. Previous work at the sit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cluded continuous, systematic excavations and basic studies of the abundant cultural remains. The study has applied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echnology and typology to the complete sample of lithic material from the 1980s excavat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Donggutuo site was a small tool-manufacturing locality where small elongated flakes and other various small tools, mostly made on small flakes, were produced, which represent a Lower Paleolithic small-tool tradition of North China. The noticeable and distinct new category of “Donggutuo (DGT) Core” is further proposed in the present paper.

As a new discovered category the naming and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onggutuo Core” are introduced with detail based on the new method of observation and statistic.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ggutuo Core” and Upper paleolithic wedge-prepared core is outlined and the further research work about it has been kept in good consideration. It is evaluated that the “Donggutuo Core (DGT Core)” is significant and inspired in research of Lower Paleolithic in North China.

To summarize the concept of the “Donggutuo Core (DGT Core)”, a new typologically named category it could be defined as follows: “DGT Core” is a sort of prepared core discovered from Donggutuo site of Lower Pleistocene in the Nihewan basin of Northern China, which was wedge-prepared for producing small elongated flakes. Considering “chaîne opératoire” the selection and design of the whole body of the “DGT Core”, its trimming work on the platform, sides and initiated knapping on the ends indicate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Upper Paleolithic wedge-shaped microlithic core in China,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It extends the beginning of microlithic tradition much earlier than previously recognized in Northern China. It is said that “Donggutuo Core” might become a new crucial clue in exploring the source of northern China's small tool industry and origin of the microlithic cultural tradition.

Key words: Lower Pleistocene; “Donggutuo Core”; Small tool; Microlithic